

闲话文人

王凯

竺可桢的去与留



竺可桢与家人

3月7日，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、教育家竺可桢诞辰127周年纪念日。

对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来说，1949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他选择留在了大陆；这一年，他离开了深爱的浙江大学。

江山易手之际，走还是留，成了摆在许多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难题，但竺可桢很早就决定了，不会随国民党去广州或者台湾。竺可桢长女竺梅1946年随恋人胡鸿慈去了山东解放区，后来在大连不幸染病去世。1949年6月9日，竺可桢正在上海，当时上海已经解放，有人突然造访，据竺可桢日记记载：“未四点有人扣门，开视见一军人，服解放军装，细视知为鸿慈，一别三年余矣。坐定余询梅在何处？鸿慈云已物故矣。惊骇莫名。余最后接梅信在去年四月间寄平儿照片，函中（约）和平后再相见，不料竟成永诀。”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，竺可桢无离开的打算，父女约定和平后再见。

1936年，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。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咨询，又与蔡元培等人商量，竺可桢提出了三个条件，即“财政须源源接济；用人校长有全权，不受政党之干涉；而时间以半年为限”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些条件大都兑现了，唯当年约定的“半年为限”一延再延，一直拖到了1949年。十几年间，竺可桢带领浙大四次西迁，颠沛流离，将一所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闻名的“东方剑桥”，竺可桢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

1949年后，竺可桢打算一直留在浙大维持局面。4月26日，他听说沪上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学生，深为忧虑，于是连续造访了浙江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，直到得到“决不入浙大捕人”的保证方始安心。4月28日，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竺可桢去沪，说“有要事相商”，29日又来电催促，在这种背景下，竺可桢独自一人离浙。

竺可桢离开的时候大雨如注，似乎在暗示着什么。原定当天下午2点40分的火车，直到晚上11点14分才发车，车厢里大都是溃散的国民党官兵，据竺可桢日记描述，这些人皆神情颓废，毫无斗志。第二天中午12点半，火车始达上海西站，车站人满为患，竺可桢最后只能从车窗跳出脱身。下午3点与杭立武见面，杭提出要他到台湾或者厦门，这就是电报中所说的“要事”。竺可桢当即拒绝了杭立武的要求，并提出辞去浙大职务。随即竺可桢安排随从人员回杭州，转告夫人陈汲“决不去台湾或广州”。

竺可桢在上海期间，傅斯年、杭立武等不断催其去台。5月6日，竺可桢偶遇蒋经国，蒋也劝他去台湾，但竺可桢还是婉言谢绝了。据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，多年以后蒋经国与他一起吃饭，曾当面告诉他：“当年我奉父亲命，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，可惜他未能前来。”

竺可桢与蒋介石父子及国民党渊源颇深，蒋氏父子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诸如陈布雷、陈立夫、朱家骅等皆浙人，和竺可桢有同乡之谊，他们在经费、用人等方面对浙大都有很大的照顾。但在1949年这个重要的关口，竺可桢还是与这些交往多年的旧交分道扬镳了。

对浙大深厚的感情是竺可桢留下的主要原因，但他的这个选择也与共产党人对他的态度息息相关。关于此事，当时担任中共

浙大党支部负责人的许良英多年后回忆说：“1949年元旦，我们用‘中共杭州工委’的名义给他（指竺可桢）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，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。”

5月26日，上海已经解放，竺可桢发现外面平静如常，公共汽车照常行驶，解放军在路执勤，纪律绝佳，也不扰民，竺可桢惊讶、新鲜的感觉在其日记中随处可见。

6月中旬，中研院被接收；7月，竺可桢应邀北上参加科学会议，来到阔别十几年的古都北平；随后又去东北解放区参观、访问。此间，竺可桢与陶孟和、吴有训等人联名给旅居海外的旧时同事和友人写信，告诉他们，“于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”，动员他们回来参加“新中国建设”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竺可桢不断听到浙大师生要求他回校的声音，有人甚至发起了请他回浙的签名活动。对于这一切，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受：“余甚为感动。”

开国大典后不久，竺可桢得知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协助郭沫若工作，不可能再回浙大了。

百味书斋

唐宝民

《湘行书简》里的爱情

1934年，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因母亲病危回故乡凤凰探望，在途中，他写了大量家信（后结集成《湘行书简》一书），这些信，大部分是写给妻子张兆和的，也有张兆和写给他的。在这些信中，我们能够读到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浓浓爱意；能够读到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切和惦念。《湘行书简》里的爱情，朴实无华又不乏浪漫，即使是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再读，依然令人感动不已。


因为受到“沈从文苦追张兆和”的影响，一直以为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感情很淡；以为她只是可怜沈从文才同意和他在一起，然而，当我看到《湘行书简》中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几封信后，才知道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，张兆和对沈从文，也是有着一份浓浓的爱意的。在沈从文离家远行的日子，这份爱意就化为一份牵挂和惦念，比如，在一月八日的信中，张兆和写道：“乍醒时，天才蒙蒙亮，猛然想着你，猛然想着你，心便跳跃不止。我什么都能放心，就只不放心路上的不平靖，就只担心这个……你一天不回来，我一天就不放心。一个月不回来，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，总免不了要心跳。”在九日早晨的信中，她写道：“倘若当真路途途中遇到什么困难，吃多少苦，受好些罪，那罪过，二哥，全数由我来承担吧……再说，再说这边的两只眼睛、一颗心，在如何一种焦急与期待中把白日同黑夜送走，忽然有一天，有那么一天，一个瘦小的身子挨进门来，那种欢喜，唉，那种欢喜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总之，一切都是废话，让两边的人耐心地等待着，让时间把那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带来吧。”在九日晚的信中，她又写道：“我告诉你我很发愁，那一点不假，白日子里，因为念着你，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。到晚来，刮了这鬼风，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。”再看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，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的口气，是拿张兆和当小孩子哄的，这种口气的本身，就饱含着一种爱：“三三（沈从文称张兆和为三三），放心，我一切好！我一个人在船上，看什么总想到你。”一个人如果爱着另一个人，那么，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，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对方，沈从文就是这样，一路走来一路想，遇到什么事都会想起张兆和来：“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。我快乐，就想应当同你快乐，我闷，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。我同船老板吃饭，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……”作为文学大师的沈从文，一路上不断发现美，他希望能与张兆和一同分享这些美；发现了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物，也希望能让张兆和看看；而且，在孤独、寒冷的旅程中，他希

望张兆和能给他以温暖：“山水美得很，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。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，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！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……”一个人的旅途，漫长、孤寂、寒冷，有着诸多无法言说的苦，但在沈从文看来，所有的苦都无所谓，只有一种苦，是他受不了的，就是对张兆和的思念之苦：“三三，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。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，因为这一礼拜来，我不为车子所苦，不为寒冷所苦，不为饮食马虎所苦，可是想你可太苦了。”感情这种东西，两个人天天厮守在一起的时候，也许感觉不到什么；人一离开，就觉得珍贵了。远行的沈从文，一边苦苦思念着张兆和，一边不断回忆张兆和对他的好，想到张兆和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深感内疚：“三三，我这时还想起许多次得罪你的地方，我眼睛是湿的，模糊了的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我的人，倘若这时节我在你身边，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！想起你种种好处，我自己便软弱了。我先前不是说过吗？‘你生了我的气时，我便特别知道我如何爱你。’现在你并不生我的气，现在你一定也正想着远远的一个人。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去！”于是，沈从文开始反省自己、检讨自己曾做过的一些对不住张兆和的事，发誓要更加珍惜与张兆和的爱情。

季候物语

王永清

惊蛰



《黄帝内经》

惊蛰，古称“启蛰”，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二月节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“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”惊蛰了，地气动了，风变得柔软起来，漾起一圈圈暖意，撩拨得庄稼舒身展体。惊蛰最是人怦然心动的，“惊蛰过，暖和和，蛤蟆老角唱山歌。”春雨如酥，阳光明媚，蛰伏一冬的蛇虫，伸一伸懒腰，纷纷从洞穴里爬出来。春天如涨潮的水，哗啦啦地一路向前，谁也捂不住了。

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，向着生机勃勃进发。麦田，是一种诱惑。放眼望去，会繁衍出许多联想。麦苗绿莹莹的，几条松软的田埂伸向田的深处，安静地聆听着庄稼生长的声音。几只鸟雀落于麦田之中，又倏忽飞起，宛如精灵，敏感、活泼。记得小时候，惊蛰时节，小孩子要拎了铜铃，跑到自家的地里，沿着田埂，边敲边唱：“金嘴雀、银嘴雀，今朝我来咒过你，吃我家谷子烂嘴壳。”如此一来，就会吓住那些贪嘴的鸟雀了。

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灵动的时节。此时，桃花红、梨花白，樱花俏，油菜花如绫如绢，更有众多不知名花儿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。杨柳枝上爆出鹅黄的新芽。竹林中的春笋，如剑刺破沃土，蓬勃向上。沟壑和道路两旁，青草也冒出了嫩绿的脑袋……惊蛰，仿佛玉女手中织的锦、画家淡墨勾的画，带着花团锦簇或湿漉漉的水汽，美得雅致温润，美得奔放淋漓。

节令就是命令，一点都马虎不得，懈怠不得。农谚说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”“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”。到了惊蛰，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大忙季节。乡间田头，农人扬鞭催犁，清沟排渍，育苗施肥……一切都按照时令节气，有序地进行着。乡村的惊蛰，寄托着乡村一年

丰收的渴望。

惊蛰同时也是各种病毒和细菌活跃的季节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：“春三月，此谓发陈。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。夜卧早行，广步于庭。披发缓行，以便生志。”意思是，春季万物复苏，应该晚睡早起，散步缓行，可以使精神愉悦，身体健康。概括了惊蛰养生在起居方面的基本要点。

作家苇岸说：“到了惊蛰，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”花红柳绿，莺歌燕舞，一切不过是春天的开场白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惊蛰就像一本书，一旦打开，便尽情宣泄，每一个章节，都被涂抹得浓墨重彩。

读史侧翼

刘绍义

古代的市侩

现在我们见到“市侩”一词，立即就想到唯利是图、庸俗可厌的小商人。但在古代，“市侩”却是买卖双方的中间人。

《新唐书·食货志四》：“鬻两池盐者，坊市居邸主人、市侩皆论坐。”清·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·别号小照》：“近俗市侩牙人，俱有别号，后生小子，并画小照。”文中的“市侩”都是指贸易活动的交易中介。过去的中介骗过买方哄卖方，目的是想让交易成功，因为无论买卖双方谁赔谁赚，中介的佣金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，于是市侩给人一种投机的感觉，不好的印象。正像林则徐在《银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》中说的：“且市侩之牟利，无论银贵钱贵，出入皆可取赢，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。”所以，在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里，“市侩”就成了《辞海》里解释的：“市侩，即牙侩，旧时买卖的居间人。后泛指唯利是图的商人。”“市侩”为什么又称“牙侩”呢？这还要从“市侩”的源头说起。

据史书记载，中国最早的“市侩”出现在汉代的马市。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把他们的马匹运到中原地区贩卖，这就需要在买卖双方有一个中间人看马定价，这样马匹交换的中间人——“狙侩”就出现了。

狙，就是壮马，好马，骏马的意思。“狙侩”就是指马匹交易的经纪人。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：“子贷金钱千贯，节狙侩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侩者，合会二家交易也。”李清照在《投内翰綦公崇礼书》中说：“视听才分，实难共处，忍以桑榆之晚节，配兹狙侩之下才。”《资治通鉴》：“及长，相亲爱，皆为互市牙郎。”胡三省注：“牙郎，狙侩也。南北物价，室于其口，而后相与贸易。”“狙侩”又叫“牙郎”“牙侩”“牙商”“牙人”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当时的狙侩都是从马的牙齿上看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，以此给马核定价格，所以，“狙侩”又称为“牙侩”。值得说明的是，现在有人把“牙侩”解释成“牙齿咬合”的意思，引申为“为买卖双方说合的经纪人”，也就是说，“牙侩”一词源于中间人的耍嘴皮子，是不足为信的。唐·谷神子《博异志·张不疑》：“数月，有牙侩言，有崔氏孀妇甚贫，有妓四人，皆鬻之。”《新唐书·张又新传》：“尝买婢迁约，为牙侩搜索陵突。”明·叶宪祖《团花凤》第二折：“你待去风月场为牙侩，他有女处深闺，你做送春的庾岭梅，引铁的龙宫石。”章炳麟《五无论》：“使牙侩设银行者，得公为之，而常民顾不得造，是则牙侩之权得与政府相等。”这里的“牙侩”都是商业交易中的中间人的意思。唐朝时期，由于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，还出现了“牙侩”业的管理机构“牙行”。到了宋代，牙行不但成了相当稳定的行业，还成了政府税收的一项来源。

至于我们现在说的“市侩”，大都是指“唯利是图的商人”，无论是郭小川《秋歌》中的“市侩哲学”还是胡适《市政制度序》里的“市侩政客”，都已经饱含贬义，没有了古代的“中介”之义。